



東方朔
作品輯注

东方朔作品辑注

傅春明 辑注

齐鲁书社

1987年·济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1854

1131854



东方朔作品辑注

傅春明 辑注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印张 88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统一书号: 10206·171

ISBN 7—5333—6609—2
I·4 定价: 1.20元

前 言

西汉武帝时期的以滑稽名世的赋作家东方朔，死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至今却很少有人把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来加以全面地研究，而任凭其被卜人、术士、志怪者流敷衍荒唐，改造成神不神，仙不仙，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今天，在民间流传着的种种迷信邪说姑置不论，即使被赫然著于书帛、载之史传的也不乏荒诞不经之语。本来就属于志怪小说的托名班固所撰的《汉武帝内传》，郭宪的《东方朔传》，托名刘向所著的《列仙传》，以及应劭的《风俗通义》等，它们编造的怪诞故事，实开后世诸迷信邪说之先河。这些留待于今后的小说史家去研究，不属我们今天论述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研究东方朔和他的作品，所依据的完全是正史本传和文人学者们的记、论之作。如褚少孙在《史记·滑稽列传》中有关东方朔的补著部分、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刘勰的《文心雕龙》、张溥的《东方大中集》、康丕扬的《东方先生文集》等等。当然，这些史料虽较志怪、传奇可靠得多，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亦不免“后世多传闻者”（《汉书·东方朔传赞》）。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也有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问题。对此，我们只好采取这样一个原则：凡属正史、文集所集材料和作品，除有充分依据以指实其伪者，暂且一概作真品对待。当否，犹待读者鉴谅焉。

一、东方朔的生平和思想

东方朔字曼倩，汉平原厌次（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1〕人。生于西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2〕，卒年不详，大约在汉武帝征和初年（公元前93年）前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本传），他应诏至长安上书，得以待诏公车，时年二十二岁。旋以恐吓侏儒得幸，待诏金马门。继以倡辩郭舍人，得幸为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方朔二十四岁，因上《谏起上林苑疏》被擢为大中大夫（秩比千石，为不定员的谏官）。不久，因小遗殿上被免为庶人，待诏宦者署。随即又被命为郎（秩比三百石到六百石，为不定员的随侍小臣），一直到死。

象东方朔这样区区一介郎官的小人物，在西汉武帝的宫廷里何止百千！他们象草芥一样，默默地生活过又默默地逝去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何曾留下过一丝的涟漪？然而东方朔却得天独厚，先是褚少孙在补著《史记·滑稽列传》中把他大书了一笔，继而班固在对他的生平事迹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汉书》中又特地为他立了传——《东方朔传》，这实际上把东方朔提到了一代名家的地位。以后，晋散骑常侍夏侯湛在东方朔的家乡为他撰写《画赞》，唐代书法大师颜真卿为其书写了《画赞》碑文，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最著名的碑帖之一。至于历代学者文人如刘勰、李贽、张溥、康丕扬等都对东方朔有过很高的评价，有的如张溥还特地为他出了书——《东方大中集》。

东方朔以区区一芥之微，为什么能在后世有着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在诸子百家中，《汉书·艺文志》把东方朔列入杂家。《汉书·东方朔传》和《传赞》的论述显然也是如此。什么是杂家？《汉书·艺文志》疏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墨、儒，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从东方朔一生的创作、生活道路和政治实践来看，他正是这样的。

东方朔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杂家？这有着历史的原因，也有着家庭的原因。建元元年，东方朔在他的《应诏上书》中曾谈到他的家世和成长：“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建元元年，东方朔二十二岁。以此上推，他是生于文帝而长于景帝时期。就时代特征来看，西汉文、景二代被史书称为盛世，仍处在自西汉建国以来与民休息政策的余绪阶段。政治上省刑罚，薄赋敛。思想界自由活跃，先秦百家之学皆有所传，统治集团甚至崇黄老而薄儒术。这从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所写的《略论六家要旨》中可以反映出来。东方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杂学到各家之术是非常自然的。再就东方朔的家庭来看，《应诏上书》中没谈他的家世本身就证明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出身名门对一个求仕者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再加上他“少失父母，长养兄

嫂”——在当时以简册为书籍的条件下，他的兄嫂能使他就学而且受到多种教育已经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了，怎么能够想象东方朔能有条件学有专师，术有专攻呢！

东方朔在踏入仕途之前的青年时期就已经成为杂家。此后，东方朔的一生，就成为一个杂家在为政道路上由追求到实践，而最终走上幻灭的一生。下面，我们把东方朔的生活道路分追求、实践、幻灭三个阶段依次加以论述。

（一）我们把东方朔应诏上书到谏起上林苑之前划作他政治生涯的追求阶段。这从建元元年起，到建元三年秋。东方朔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

前面说过，东方朔还在求学阶段就已经是个杂家。“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汉书·艺文志疏》），通过议论朝政的得失而骤取功名富贵是它的主要出仕手段。所以，建元元年，武帝下诏求“直言极谏之士”，正是东方朔求仕的大好机会。可以想见，当时的东方朔是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希望象“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答客难》），名垂竹帛的。所以他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人主……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并且还写了《应诏上书》，高自称誉，要求一跃而“为天子大臣”。但是这次求仕失败了，只落得个“令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汉书·本传》）的可怜下场。至于失败的原因，这时的东方朔并没有总结出来。何况，初次失败并未根本挫伤东方朔求仕的锐气。既然历史上苏秦、范雎都是经过几番周折最后才一举成功的，年纪轻轻的东方朔又何须戚戚于一时的得失？在他的心里，接近君主的方法多着呢：“伊尹蒙耻辱，负鼎俎，和五味以干汤。太公钓于渭之阳以见文王。”（《非有先生

论》)……他终于通过恐吓侏儒(见《汉书·本传》)的办法得见汉武帝,取得了“因使待诏金马门,稍得亲近”的初步成果。以后,他又通过射覆、辩难郭舍人(以上均见《汉书·本传》)等滑稽手段,使“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以调笑滑稽为郎是汉武帝爱幸东方朔的原因和结果,却不是东方朔的目的和希望。东方朔希望汉武帝看中他的不是他的滑稽和诙谐,而是他的言论和主张。还在东方朔因恐吓侏儒而初见武帝的时候,他就明确提出要求:“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但索长安米。”(《汉书·本传》)可见,东方朔以滑稽取幸只不过是接近武帝的手段,而其目的一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直言极谏“一当万乘之主”,而立“为天子大臣”的。

机会终于来到了。建元三年秋,汉武帝“使大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鳖屋以东,宜春以西……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吾丘寿王奏事。上大悦,称善。时朔在旁,进谏曰:……。”这里所进之谏,就是东方朔著名的全文载之于《汉书·本传》的《谏起上林苑疏》。东方朔因之被武帝擢为大中大夫。至此,东方朔以进谏而为天子大臣的出仕之道的实践阶段,便算开始了。

(二)从武帝建元三年到太初二年(公元前138年到前103年),东方朔由二十四岁到五十八岁,即从他上《谏起上林苑疏》到《化民有道对》,我们把它划作东方朔努力仕进的阶段。在这期间,为了达到“为天子大臣”,“留泽后世”的目的,他曾由两条途径努力追求过:一条(主要的)就是他毕生所希望的一言悟主的忠谏道路,再一条(次要的),是他一度尝试过的企图立功边陲的道路。

总结东方朔一生谏诤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一 谏汰奢扰民、二谏淫乱非礼，三谏殉情废法。

谏汰奢扰民，以《谏起上林苑疏》、谏汉武帝赴海求仙和《化民有道对》为代表。谏起上林苑事，前面已经谈过，下面简单介绍谏赴海求仙和化民有道二事。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汉纪》十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赴海求蓬莱，群臣谏莫能止。东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上乃止。”

《化民有道对》亦见《汉书·东方朔传》。约在武帝太初元年，起建章宫后的第二年，“时天下侈靡取末，百姓多离农亩。上从容谓朔曰：‘吾欲化民，岂有道乎？’”东方朔劝其戒淫侈，尚俭率，效法文帝，“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则天下可“昭然化之”。

谏淫乱非礼，以谏止董偃入宣室为代表。董偃是武帝长姑馆陶公主窦太主的眉首。馆陶公主老而无耻，以二十余岁妙龄青年董偃供其淫乐，本系汉宫丑闻。汉武帝不以为辱，反而对董偃倍加亲幸。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在上林苑为窦太主置酒宣室（未央宫之正殿），使谒者引纳董君。“是时，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斩罪三，安得入乎？’……有诏止……。董偃之宠由是日衰。”

谏殉情废法，以贺诛昭平君为最突出。大约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前后〔3〕，武帝妹隆虑公主之子、武帝女夷安公

主之夫昭平君醉杀主傅，汉武帝忍痛杀之，而“为之垂涕叹息”，“哀不能自止”。这时，武帝左右也都形缘情牵地装出一副副悲哀的假面。独东方朔向前奉酒上寿再拜称万岁。

东方朔直言极谏，历来受到好评。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褚先生借汉武帝之口说：“顾东方朔多善言。”班固在《汉书》中给他立传的时候，已经看出他谏诤的严肃性和正义性，所以在他的《传赞》中，说他“正谏似直”。明代康丕扬在《东方先生文集序》中，就更多地从他的思想和政治本质来评价他：“愚尝读班孟坚《汉书》而深有感于东方先生，讽谏直谏各归于正，超出汉廷之上，大有益于人主。……惜夫世人不察，猥以吾邱寿王辈而共目之，甚有列于滑稽者矣。”康丕扬虽仍然是从“大有益于人主”的角度称赞东方朔的，但他能把东方朔和以谄媚邀宠的佞臣吾邱寿王、专以调笑俳谐取容的幸倡郭舍人等区别开来，也不能不说他是具有慧眼卓识的。

但他的观点仍然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观点。

总析东方朔一生谏诤的内容，谏汰奢扰民和谏淫乱非礼，这无疑是儒家仁政安民和美俗化民思想的表现；而执法不避亲仇，又正是法家思想的最优秀部分。这里不禁就有个更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杂家的东方朔，为什么在接受各家之学的时候，往往所接受的大都是各家最进步的成分？那么，在主导儒家仁政安民、美俗化民和法家执法不阿的思想背后，还隐藏着一种什么更本质的思想呢？

现在，再回过头来仔细分析一下激发东方朔直言极谏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东方朔在《谏起上林苑疏》中说：“鄠、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又坏人冢

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原来他是为着平民的利益，解除平民的苦难而上疏的。

在贺诛昭平君时，他说：“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讎，诛不择骨肉。……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原来他也是从安定人民生活而直谏的。

东方朔为什么那样憎恶董偃，竟然甘冒得罪馆陶公主乃至汉武帝的风险而力阻其侍宴宣室？因为“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而这也恰恰是当时武帝本人所喜爱和追求的。所以东方朔在《化民有道对》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也者。”他要求人君“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这种崇德尚俭的思想和谏起上林苑的思想是一致的。东方朔对统治者进行节用爱民的劝谏，总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为出发点的。

再拿谏止汉武帝赴海求仙来说，仔细阅读《资治通鉴》，玩味东方朔的语气口吻，就能体会出他并不相信神仙真的存在。此谏不过借止武帝赴海求仙而劝其“有道”罢了。为什么要力劝武帝还宫静处呢？原来汉武帝此次封禅之举，其意不过借之以巡行游乐，寻药求仙而已。请想，封禅本是祀天大典，武帝之行竟不带史官（因而气死了司马迁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而带倡优百戏，其目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读者试想，如此浩浩荡荡的封禅大军，沿途供应，百役千差，其残刻扰民之甚可想而知。东方朔劝其还宫静处，实在是止扰安民的唯一良法。

现在，问题的答案清楚了。原来东方朔一生直言极谏的主导思想，大都是从人民安危利益出发的平民思想。

东方朔出生于平民家庭，他对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所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有着较深的认识和感受。进入宫廷之后，又一直处于被戏弄被侮辱的卑贱地位，“积数十年，位不过侍郎，职不过执戟”，以至“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均见《答客难》》）。家庭经济生活并不富裕。这种拮据的生活和政治的失意，却使他的思想和感情与广大人民有所接近。平日，他“喜为庸人（平民）诵说”（《本传·赞》），因他经常与人民接触，所以他对人民的苦难也就有较深的了解。这就是东方朔的谏、奏、疏、对中所表现出来的平民思想的实质和来源。

但是，东方朔并没能沿着直言极谏的道路爬上去。他的“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在这期间，他还尝试过另外一条仕进之路，那就是效功边陲。

做为杂家的东方朔自幼学过孙、吴兵法，战阵之具。公车上书洋洋数万言，谈的什么？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汉书·东方朔传》中仍可考其大概。“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久之，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不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终不见用的原因，固然由于他的文章“指意放荡，颇复诙谐”，但这毕竟是技巧末节，其实质性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以此推之，东方朔公车上书没有受到重视，自然也是由于专商鞅、韩非之语的缘故。汉武帝从来没有重视过东方朔的军事才能。然而东方朔却确具军事才能且又是相当留心边事的。《史记·滑稽列传》中，曾记载这样一段故事：

建章宫后阁重栳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

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愿赐美酒梁饭大飧臣，臣乃言。”诏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于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乃复赐东方朔钱财甚多。

这个故事在褚少孙的眼里，是被当作滑稽多能（见物卜事）记载下来的。其实不然，东方朔两次请求赏赐，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准备答案罢了。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早就指出这点：“方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驺牙之称是东方朔机智巧思的结果。预推远方来归是东方朔留心边事，熟悉匈奴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及其发展趋势的结果。据《汉书·武帝纪》载，混邪王来降汉在元狩二年秋。前推一年，辨驺牙当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0年），东方朔四十一岁，这大约也正是他上书谈富国强兵之计的时候。可见，东方朔想立功边疆的政治企图比起他的诤谏道路来破灭得更早。

自上《谏起上林苑疏》到《化民有道对》，东方朔向着自己的政治目标奋斗了近四十年。这四十年，是东方朔政治实践的四十年，直言极谏的四十年，也是他政治理想彻底破灭的四十年。这里，我们所说的破灭（或失败），并不是说东方朔曾因直言极谏而获罪，也并不是说东方朔从来没有从直言极谏中得到过物质和荣誉的好处，而是说东方朔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极谏的结果，几乎一次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据《汉书·本传》所记，他谏起上林苑的结果是“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云”，他止

纳董偃进入宣室的结果是“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马门”，“是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他在《化民有道对》中谏武帝崇德尚俭的结果是：在建章宫后又继续修建了光明宫……。东方朔的直言极谏彻底失败了。当然，他“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的理想也彻底破灭了。

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从东方朔的《化民有道对》之后，除临死前劝武帝“远巧佞，退谗言”外，再也找不到他有重大政治活动或诤谏上书之类的记载。但是，东方朔所留传后世的重要著作，却大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时间上比较可靠的，如《据地歌》、《戒子诗》、《七谏》，和他的代表作《答客难》以及《非有先生论》。这些作品，有的借吊他人而自悲身世（如《七谏》），有的以讽咏而谈处世哲学（如《据地歌》、《戒子诗》）。而《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直接就是东方朔一生政治理想的反映和政治生涯的总结。

东方朔的政治理想就是象非有先生那样，通过忠言直谏起到治国安民的巨大作用。但先生之名既曰“非有”，就证明东方朔认识到他的政治理想的实现是不可能的。而他行非有先生之道的唯一结果，生活已经告诉他，就是“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持戟……同胞之徒无所容居”而已。还没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非有先生论》）已经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东方朔一生奋斗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总结自己与苏秦、张仪命运不同原因时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世，曾

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时异事异。”无疑，这总结大致说是正确的，是符合历史的。但是，单单认识到这种程度还是不够深刻，不够全面的。今天我们分析起来，起码应有如下原因：

（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东方朔杂家思想体系与儒术独尊的时代思潮的矛盾。

东方朔是在文、景时期成长起来的。但到了他仕进的时期，西汉社会却正在向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武帝时代迅速演变。关于汉武帝刘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被某些人生硬地贴上了一个法家杰出代表的标签，把他的法家思想极其片面地极度夸大了。汉武帝究竟是法家还是儒家？（当然还可争论。）我们认为，他既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思想确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就证明他自己的思想主流属于儒家。其实，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汉武帝之成为儒家或变为儒家，又何尝不是历史发展之必然呢！

武帝上台的时候，由秦汉两代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制度已经十分完善和巩固起来。其时，历史要求统治集团的已不是创建它，而是如何地保卫它和永久地巩固它。这就需要统治者除了加强武力镇压之外，必须再找上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而这时的儒家学说呢？它自孔子创建以来，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融合吸收了诸子百家（如法家、道家等）中的某些成分，把自己改造、发展成为最适应于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思想体系（例如《荀子》的思想）以后，在汉初的自由竞争中逐渐赢得了胜利。到了武帝就位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一家独尊的趋势来。请再看《武帝纪》的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

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析。’奏可”。丞相卫绾反对儒术之外各家。奏章得到批准，并且立即把所有应诏之士统统赶出长安。这就足以证明武帝刚刚即位之时，儒家的思想和势力在朝廷上就已经占了上风，而武帝的思想从即位一开始就基本上倾向于儒家（当然这不能反证汉武帝没有法家思想）。所以，七年之后，元光元年再次下诏选士的时候，就只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了。于是著名的儒家人物“公孙弘、董仲舒辈出焉”。从这两次选士的区别和发展趋势来看，武帝朝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就已成定局。此后，董仲舒的奏议，汉武帝的诏令只不过是把现实诉诸明文罢了。

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东方朔建元元年公车上书为什么没受到重视，甚至连“待诏公车”的可怜结果，也不是由于“其言可用”的原因。其实，若不是他的滑稽之才被当时的武帝偶然看中，也早就被卫绾的奏章所赶走，而且会永远失去再被推荐的机会。当然，以滑稽而被幸留，实际上也并非幸事。因为它使东方朔一进入汉廷就是以——个准倡优的面貌和地位出现的，而这一卑贱而屈辱的地位正是东方朔一生不幸的开端，虽然东方朔自己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这点。

（二）是东方朔政治主张中的平民思想与统治集团的物质利益和伦理道德的矛盾。关于东方朔在直言极谏中的平民思想前面早已论述过了。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分析他一切谏诤最终都归于失败的原因。东方朔谏武帝起上林苑，谏武帝赴海求仙，奏请武帝诛杀董偃，谏武帝崇德尚俭之所以失败，是以武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本性所决定的。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从物质利益来说，根本就是在对劳动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之上的，它不可能

因人民的利益和痛苦而终止其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和追求。再就东方朔的执法不阿的主张来看，它与统治集团亲亲的思想也是根本对立的。汉武帝偶尔执法诛杀了昭平君，但更多的是对他的亲属和近幸者的苟法和放纵。同是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就记载有郭舍人谏武帝赦免乳母的故事。即如武帝不究馆陶公主纵淫败伦之罪反而宠幸董偃的事实，不也反映着封建统治集团的法律和道德的虚伪、堕落的阶级本性吗？

东方朔的谏诤必然要失败，因为他表露出的平民思想与统治集团的利益是根本矛盾着的。

（三）是东方朔滑稽狂放的性格与统治集团的宫廷威严和统治秩序的矛盾。这将是本文下一部分论述的主要内容，在此就不多说了。

二、东方朔的滑稽性格和它的社会性

对于东方朔的滑稽性格和他在汉廷上的准俳优地位，在历史上是公认的，也是历来研究者如鲁迅、钱钟书等所一致强调过的。其中以冯沅君先生的《古优解》和《汉赋与古优》论之最详，本文不再重述。

今天，我们要着重研究的是东方朔滑稽性格的表现、目的、形成的原因以及它的社会性。

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性格（或者说是个性特征）是这个人在他特有的思想支配下接触社会而给别人留下的总的印象特征。所以，一个人的性格也和一个人的思想一样，是在其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地位中形成，反过来它又曲折地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影子。